

華僑文教紛紜

梁子衡

僑務叢談之六

(本文插圖刊第50頁)

僑教會議強大陣容

中共侵據大陸，政府遷臺以後，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廿一日召開全球僑務會議，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一日召開華僑文教會議。當時僑務委員會有三個重要的決策：第一、為加強僑胞團結，集中僑胞力量，參加反共復國工作，乃召開僑務會議；第二、本「無僑教即無僑務」之認識，乃召開華僑文教會議；第三、為發展海外華僑經濟事業，以確保僑胞生存與發展，乃召開「華僑經濟檢討會」。

吾友陳以令兄近在僑聲為文舉出「僑務政治觀」、「僑務經濟觀」以及拙作「僑務文化觀」等三觀。以令兄是一位闊過十八銅人，出自「少林寺」，有「真材實料」的僑務專家；我在僑務理論上只是一個閉門自學，懂一點「花拳繡腿」的「江湖術士」。以令兄所舉的「三觀」正是當年僑務委員會三大政策的寫照。不過，我所想的「僑務文化觀」，並非機械論的說法，只是說文化乃僑務的重心，我國移民經濟因素是動機，文化因素是動力，自不能排除政治、經濟而獨立。

我常認為我國移民有三大特點：第一、人口眾多，海岸綿長，向外移民無法阻絕；第二、海外僑胞多生活於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若干人「夷化」了，又有更多的人踏着「夏化」的腳步上來，一消一長，「長」每多於「消」；第三、華僑對祖國愛護，辛亥革命、抗戰八年、行憲戡亂、反共中興，出錢出力，無役不與，故早已享得「華僑為革命之母」的尊譽。但要確保華僑「中國化」的孔道暢順，則應把握文化這一特點，加倍重視與努力。

「華僑文教會議」繼「僑務會議」之後召開，是由「組織」進入「教育」的階段了。文教會議可以說是海外文化、教育、新聞界的大結合；也是海內外文化、教育、新聞界的大團結。會議出席代表一共二百五十三人，名單恕不贅錄；僅列一些重要人選如下：

1. 主席團：李其牧、梁明、張亦鐸、吳慎機、伊靜軒、陳哲、王昭德、董心銘、張子柱、李雪英、賈錫麟、王元龍、中學庸、胡秩五、張國興、張瑞芳、吳主惠、李石曾、鄭文田。主席團中包括了文化、新聞、影藝、學術各界人士。連

黨國元老李石曾先生也參加了。

2. 大會宣言起草委員：章子勤、劉芝田、高直青、李偉、宓汝卓、姚湘勤、朱子範、尹嘉、梁寒操、王淑陶、孫岩越、李琴、祝秀俠、鄧公玄、蕭次尹、許君武、黃天爵、董世芳、胡秩五，並以梁寒操、宓汝卓、胡秩五為召集人。

3. 「當前華僑文教工作綱領」起草委員：林雅秀、饒簡、戴始仲、陳存藩、張子良、嚴南方、黃文袞、鄭克定、崔載陽、謝幼偉、毛松年、黎東方、劉增華、李樸生、卜少夫、馮鎬、梁道羣、重挺光、李其牧。並以崔載陽、林雅秀、卜少夫為召集人。

用電影一句話，這是一個最強的「卡司」。在文教會議致訓及講過話的有先總統蔣公、陳故副總統、葉故外交部長公超（當時的職務）、彭參謀總長孟緝、俞故省府主席鴻鈞。彭總長碩果僅存，但亦垂垂老矣。

鄭彥棻的一句名言

文教會議最大的收穫是通過「當前華僑文教工作綱領」，最大的成就就是加強鼓勵華僑青年回

國升學。

「當前華僑文教工作綱領」一共十條，我摘要錄下：

一、華僑教育文化之最高方針，應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關於教育文化之規定，發展華僑民族精神與生活技能，發揚其互助心與生存力，務使各地華僑均能與僑居地政府人民友好合作，由互助生存以獲致當地社會之繁榮，進而求國家民族之生存發展，及世界永久和平之確保。

這一條關係到整個文教的基本精神，我錄下了。

二、當前華僑文教之主要任務有三：一為華僑文教事業之鞏固；二為華僑文教內容之充實；三為華僑文教水準之提高。

這一條關係到文教任務的內容，我也錄下了。其餘第三至十共八條，都是指出政府與僑胞應有的努力與配合，沒有轉錄。我曾批評過，這個綱領文字太長，有欠簡潔，是一個翔實的綱領，而不是一篇好的文章。

當時僑務委員會的鄭彥棻委員長似是以「文教僑務」主政，他創造了「無僑教即無僑務」一句名言。在他任內，他大力、決心召開「華僑文教會議」，鼓勵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在國內還發起「僑生之友」運動，呼籲各界人士照顧回國升學僑生，給與僑生以家庭式的溫暖。

接替鄭委員長彥棻的是陳委員長清文，他原任招商局董事長，本來是以「僑務經濟觀」上臺，他被發表委員長職務後，曾約我於招商局晤面，擬續用我為主任秘書（當時我擔任僑委會主任秘

書），但因他問了我下面三句話：「你是順德的嗎？」、「你是中大的嗎？」、「你是留法的嗎？」這無意中傷了我的自尊心，我便婉拒了他的栽培。也因此，他就叫我為「潤佬」。（此事我曾在本刊寫過，陳清文先生讀到後又大笑的說：「這個潤佬」）當陳先生到任後，他反而對華僑教育大感興趣，他曾吩咐下面的同事，什麼他都請副委員長來管，他只管僑生。過了些時，他常在午夜夢中，被學校、警所或會裡同事吵醒，要他管管僑生，終又使他大叫：什麼都可以管，只有僑生不能管。陳先生學識豐富，為人慈厚，從性格來說，他是一位標準的委員長人選，他雖怕僑生給他麻煩，但始終認為僑教很重要。

陳清文先生去，周書楷先生來，他像趙子龍一樣威武，從外交部轉到僑委會來指這個「僑務包袱」。僑胞看到外交、僑務終歸「一家」，非常興奮！我於民國四十九年由越南返國，回任僑委會的參事，有一天他忽然找我晤談，我大吹我的「僑務文化觀」（當時未創出這個名詞，只說文化重要），他似乎給我說動了。過了兩三天，他要我擔任第二處處長（主管文教），他說了之後，還派當時任主秘的龍運鈞兄蒞臨寒舍勸任，都被我婉拒了。跟着他再請鄭彥棻先生督促，希望我接受。於是，我盡力的拖，拖了一個多月，乃轉任國民黨中央第三組的秘書，當我向周先生呈遞辭呈時，他批示：「割愛照准，改聘為本會顧問」。此後，周先生對我愛護有加，成為莫逆之交。

我常說周先生憑他的「肚皮」可當「宰相」

。我也相信一個人的成就，必定在才識、能力、氣量、抱負之中具有高度的修養。

用炒牛肉化洋丈夫

華僑文教會議的宣言中有這一段話：

「我國有五千年的優秀文化歷史，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倫理信條，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政治哲學，尤為促進世界大同所必由之路。國父孫中山先生繼承中國固有之優良文化傳統與攝取西方文化思想之精華，而創獲三民主義之真理，其終極目的，即在促進世界之大同。」

我認為僑務工作的理想，便是促進世界大同的理想。如果國內外人士認識這一理想的偉大，便不會再說中國文化保守，中國民族狹隘，中國僑民組織封建了！

我力主「僑務文化觀」重要，便有人指我「落伍」，甚至說我是僑務觀念上的「保皇黨」。我真不知是否廢了中國文化才算進步。試問「進步黨」的主張又如何？

我國文化，乃「化」重於「文」，有些中國人雖不認識中國字，但日常生活却比認識中國字的中國人更中國化。我有一位世姪女嫁了一位洋人，她老是對他丈夫說「我們中國人做人之道」，相處兩年，感情毫無進展，她請教於我，我對她說：「以後少說孔子、孟子，多做彭長貴（湘菜）、蘇怡（粵菜），拿炒牛肉、甜酸排骨來打動他的心。」我主要是要她「化」他，不必單是「文」他。

「華僑文教會議」重視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

，也重視西方文化思想的精華。有趣的是，出席人員有「世界化」的李石老（石曾），有洋博士的黎東老（東方），有中國化的梁寒老（寒操）；從事電影的有王元龍、王豪、張國興、董心銘；從事音樂教育的有申學庸；教育界名人有崔載陽、潘重規、鄭通和、倪亮、吳康、吳主惠、孫岩越等；新聞界名人有魏景蒙、卜少夫、馮志翔、黃仰山等，均係國家社會的精英人物。

從他們的背景、教育種種來說，真是新舊融和、中西一致，為中國文化四海貫通、湖江一色的，一個湧現，一幅美景。

回國升學非所用

我在文教會議後，始終根據中國文化，「化」重於「文」的觀點而有一個想法：僑生回國升學應該是生活國內化、教學特殊化。即是說，僑生回國升學，最好與國內學生「同宿」、「同食」、「同遊」、「同樂」，使他們在生活的潛移默化中，加強對祖國的認識與認同；而教育必須特殊化，除國內規定課程外，應酌加一些語言教育及僑居地的文化、政治、經濟等有關的教育，使他們將來不只是成為國家的人才，更可成為僑居地的領袖。

否則，假如我們把僑生回國升學的生活特殊化、教育一致化，那他們在國內仍然是僑生與僑生「同宿」、「同食」、「同遊」、「同樂」，畢業後連國語也難說得好了。

至於教育一致化影響亦大，他們在國內求學四年或若干年，既不願離親別戚在國內就業，又學非所用，難回僑居地發展，終必抽空了海外僑社的人才。這一想法，在寫到此處時說出，既有骨梗在喉一吐之快，亦可供當局對僑政決策之助。（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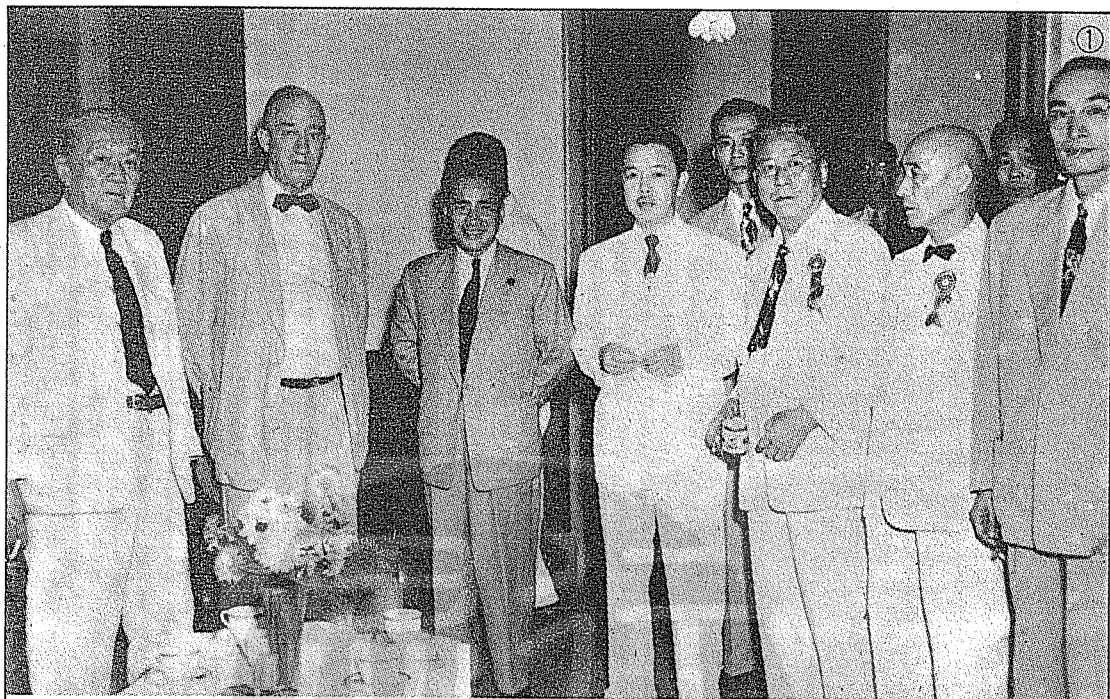
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①鄭彥棻(左三)早年訪問泰國與文教界僑領合影。

②「僑務叢談」作者梁子衡(中)與美國金山華僑中藝舞蹈團合影。(文見109頁)

